

妖魔化与 媒体轰炸

西方
新冷战思维批判
媒体轰炸的背后
美国新闻热线上的交锋

李希光 刘康 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后冷战时代的新闻霸权
揭开文化帝国主义的面纱
西方传媒洗脑十四招



妖魔化与 媒体轰炸



李希光 刘 康 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魔化与媒体轰炸 / 李希光等著 .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99. 11

ISBN 7-214-02585-X

I . 妖 … II . 李 … III . 反华 - 新闻报道 - 批判 - 西方国家 - 文集 IV . G219.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128 号

书 名 妖魔化与媒体轰炸
著 者 李希光 刘 康等著
责任编辑 唐爱平 张 凉 吴立中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页 2
印 数 1—10 125 册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585—X/G · 824
定 价 16.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0世纪最后的一年是多事之年。

对于我和李希光这位老同学和多年合作的老朋友来说，1999年的开端忙碌而有意义。一开春，他就从北京飞越大洋，来到美国学术重镇哈佛，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做半年的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美国政治精英荟萃之地，美国参与高层决策的专家、智囊和其他精英，都要在此一聚。美国人不因为希光和我提出了“妖魔化”的命题，就把他当成妖魔而拒之门外，而是客气有礼地把他请到了美国政治精英的腹地。

李希光一抵达波士顿，就给我来了电话。我们寒暄了没几句，就讲到合作的事情，大家都感到兴奋。自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出版后，风风雨雨，已经过了三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尽管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但由于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是很了解各自的处境和想法的。今天的通讯手段使人们的距离缩得很短。我

们的联系大量使用因特网和 E-mail,信息又多又快,我们商定合作写下一部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本书,当时写作和出版都极匆忙,比较粗糙,国内很多读者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书出版后,在海外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反对和赞成的意见都非常多。我本来是待在校园“围城”之中的教书匠和坐在书斋里写字的“坐家”,离尘嚣甚远,但由于这本书的缘故而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这本书引起的反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各方面都感受到压力。去年我在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的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做了一学期富布莱特访问教授,遇到从北大去台湾开会的一位老朋友,劈头就问:“老兄你怎么了,这一年多你几乎销声匿迹了,你遇到什么麻烦了?要振作呀,老兄!”我笑道:“你看我像是意志消沉的样子么?不过是有点累,要休息一下,静静地想一想罢了。”

说老实话,这几年我的心情的确很复杂。我与李希光写书的原意,是对美国媒体、美国大众文化和美国汉学界做一些批评,把中国读者所不了解的真相讲出来。这些领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是我们赖以谋生的领域,对其进行批评是很正常的。何况事关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事关我们赖以生存的领域的发展动向,非同小可。身为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的读书人,有话当然是该说就说,不料却引来了各种非议,有些话非常恶毒。

我在家静思有日,虽不欲多言,但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世间发生的事情。我这个人,看来天生如此,曾经写文说,我做学问和做人一向以世俗关怀为本,不求“超越”与“终极”。希光到了哈佛,距离一下子就很近了,感受到他的一股激情,汹涌而来。他是个在国际大事件第一线的实干家,永远是风风火火。我们谈起来,感到很振奋,觉得不可患得患失,亦不必优柔寡断,而是要切切实实,认认真真,继续我们的批评与思考。

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亚洲,风云骤起,波谲

云诡，需要我们大家去共同关心，共同努力。我们的关怀，不是为了自己之私欲，而是放眼世界。想到这些，也就坦然和释然了，不太去在意别人是如何议论我们的了。

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要清醒和理性地了解美国，而不是在情绪上以美国为宣泄对象。我从来就不主张随便对任何人说不，而是把不同观点的对话和众声喧哗，视为我们这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的基调。我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的前言里，就一再强调要有清醒和冷静的态度。当然那本书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东西。另一方面，冷静和清醒又不是完全没有感情因素，那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是我永远的祖国与故土，生生死死，我都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我已生活了十六年。大学一毕业，也就是二十多岁，即来到美国留学。在美国生儿育女，安家立业。因此像我这样的人，对中国、对美国都很有感情，真诚希望两国之间和平共处，不要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美国已经有相当一批，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大致相同，极端反美或反华的都是极少数。我总觉得在美国的中国人跟犹太人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在美国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事业有成，而且都热爱自己的民族与文化，同时对美国也有由衷的感情。所不同的是，犹太人基本上融入了美国社会主流，甚至在许多关键领域进入了美国的核心，如金融、传播、文化教育等等，犹太人的祖国以色列因此受到美国特殊的偏袒。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人的情形就有天壤之别了。

我跟希光在电话上谈了很久。放下电话，仍觉得意犹未尽，我又打开电脑，给他发 E-mail，想把合作的事情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我写道：

“我们的目的是了解美国，批评和揭露美国媒体对中国、对一切它不喜欢的国家与人所进行的妖魔化。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和

平,反对新的冷战。”

尽管我们有美好的愿望,但现实总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展。1999年的世界大势,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克林顿遭遇到美国历史上对总统的第二次清算,“世纪大弹劾”把他搞得声名狼藉,气急败坏。为了转移视线,也为了泄愤,他一边在电视前向美国公众作可怜状,一再道歉认错;一边气势汹汹,下令美军对伊拉克实行空中打击,狂轰滥炸一番。报载,俄罗斯杜马议员联名给莱温斯基小姐写信,请她给老情人克林顿打电话,制止他对伊拉克的野蛮轰炸。这是俄国式的幽默,也反映出人们对美国的老大作风的不满。

接着就是巴尔干战火。美国媒体的轰炸也迎头赶上,铺天盖地都是对米洛舍维奇的妖魔化。畅销书排行榜上也撤下了讲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案的《莫尼卡的故事》,换上了诸如《巴尔干魔鬼》之类的书。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不断加大妖魔化中国的力度,把所谓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盗窃美国卫星导弹技术案炒得沸沸扬扬。朱镕基总理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的通栏新闻,就是“揭露”所谓中国盗窃美国核机密的“内幕”的文章,算是给朱总理的一份“见面礼”。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狂轰滥炸,美国媒体也密切配合,对南斯拉夫、中国等国家,全面攻击。大量的煽动性报道,效果显著。今年6月2日,《时代》周刊与CNN有线电视台公布的民意测验说,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比伊拉克与南斯拉夫更大的敌人。

“人权高于主权论”的调子,也越来越高。一股新冷战的寒气,正在向人们吹来……

当巴尔干正是硝烟弥漫、血流成河的时候,美国东部已经是春光明媚。4月初,我再度邀请希光来宾州大学演讲、访问。一周内安排很多学术活动,也包括会见媒体,接受公共电视台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对两位作者的采访。4月19日,《北京青年报》摘要

发表了我们关于科索沃真相的对话，在北京的新闻界引起了很大反响。5月11日，我从宾州州府哈里斯堡飞往北京，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之邀，去清华访问与讲学。在临行前四天，发生了美国导弹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事件。美国媒体立即调准了音阶，众口一词，咬定了是误炸。不到两天，就迅速把新闻的主题转向中国国内“由中国政府一手操纵”的“暴民”袭击美国使领馆、攻击美国人的事件，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又即刻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我在临行前几天，密切注视着美国的媒体。我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

“我特别注意北约袭击中国大使馆后，美国政界与媒体的反应。总之，双方的口径高度一致，这是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以来的一贯现象。他们的说法，一是‘北约情报判断错误’，二是‘真正的罪人是米洛舍维奇’，三是‘我们的轰炸非常成功，必须继续下去’。”

我想这说明了强权政治是当今世界的现实状况。当前的全球化根本没有改变强权政治的局面，中国对全球化和强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美国和北约现在杀害了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义愤填膺，作出强烈反应。不过我希望再次强调，事件之后，我们需要更多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我们需要认识的关键问题，就是究竟是谁拥有真理？应当从谁的立场看问题？如果从美国政界和媒体的立场看，似乎是一目了然：我们美国拥有真理和正义，罪犯是南斯拉夫，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偶然也会犯错误，误伤了你，但你不断纠缠，就是你错了，你是否要站在罪犯一边？你是否跟罪犯同谋？我们是为正义、自由、人权、民主而战，你们中国呢？

当时我虽然强调要冷静和理性，但心情却非常沉重。我太太送我到机场，路上我对她讲：

“这两天刚刚读完了作家老鬼的纪实体小说《血与火》。书里讲

他在小学的难忘的经历，高年级的大同学，特别是六年级的，有那么一伙横行霸道的，在校园里，想欺负谁就欺负谁。见到低年级的小同学弱小可欺的，不分青红皂白就一脚踢翻，你要是哭喊的话，更是一顿拳打脚踢。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不也是一样的情形？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讲？”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给研究生讲专业课的同时，也应邀在北京和南京的部分高校做了几次讲座，谈一谈我对于巴尔干战争中媒体轰炸的看法。我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以这次轰炸为契机，认真思考，认真学习，切勿情绪化，也千万不要时过境迁，错过了这次学习和反思的机会。我同国内的学术界、传播界朋友谈了很多，获益匪浅。我们谈到学习和研究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也许比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学习的紧迫感。首先要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国，并且学习美国的好的东西。中国当然不能学美国的强权和霸权，中国必须坚持反霸权，和平是中国至高无上的目标，也是中国最大的利益所在。中国也不能全盘照搬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搬过来就成了南橘北枳。

今年6月初，李希光回到北京，我和他又做了一次长谈。我们谈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和严峻。我们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严重的妖魔化。在国际上，中国媒体的处境相当困难。这次科索沃危机和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后，西方媒体加强了对中国媒体的攻击，这种妖魔化最近仍在不断升级。要知道，塑造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媒体的作用是关键。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媒体，首先是破坏形象塑造者自身的形象，这是釜底抽薪的战略，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形象，基本上是由美国为主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来塑造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是被美国媒体严重妖魔化了的形象。这样一个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对于美

国和世界公众的影响非常之大，不仅被美国公众广泛接受，也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美国的传媒基本控制了国际传媒，美国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观点，美国的新闻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新闻。

中国面临的国际媒体和全球信息传播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被美国掌握的，它对中国怀有敌意和偏见。形势非常严峻，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美国在一切领域都要称霸世界，它要让世界按照美国的意图来观察和行事。中国当然不能按照美国的思路来观察和行事。中国也不可能让世界按中国的方式来观察和行事。然而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因此中国必须对世界发展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对国家利益予以至高无上的重视。在信息传播方面，中国要学会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媒体与传播的方式、语言、角度，来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对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策略，更是要了如指掌地把握它的所有形式、语言、技巧、手段，才能与它一较高低。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较量。但是中国别无选择。

我跟许多朋友谈到了学术研究的问题，大家都认识到，要有紧迫感，要研究最迫切的战略问题，紧紧抓住现实问题，要在真枪实弹的实际斗争中练兵。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美国人很注意从现实和实际出发。美国的苏联东欧研究、东亚研究、区域研究等学科，最先是从政治、军事的国际战略实际问题开始的，由于这些研究工作事关国家利益，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在哈佛、普林斯顿等一流学术重镇成立研究中心，凝聚和培养人才，然后逐步形成学科，建构理论体系。

大家还谈到，学术研究必须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出发，以研究国际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为主导。中国的国际战略要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基础。

不少朋友比较赞成我们提出的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与国际媒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西方搞的所谓中国威胁论。这是个纲，纲举目张。其他如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等，都是围绕着中国威胁论这个主题。我们的研究要落在实处，要高屋建瓴，就要紧紧把握国际战略，抓住纲，分析国际动向和国际思潮。

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与中国自己的传播媒体是分不开的。我在与李希光的几次对话里，谈到中国传播媒体自身的问题，要认真思考反省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首先要全面，不宜过分讲好话，讲得太多了就不能令人信服，不中肯，不实事求是。所以既要全面，又要注意把握分寸。不言则已，有言必中。如果把自己讲得太好，别人不仅不信，而且对你更要提防。“宣传”这个提法，蕴含了单方面的表达和灌输，不是双向的交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提法，在国际交流中，不应该再用宣传这个词了，而是强调双边、多边的交流与沟通。这个词英文就是 communication，也就是传播的意思，突出的是双向多边的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新的冷战，中国必须深入透彻地研究美国。对于美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政策、意识形态，美国的方方面面，都要有全面、深入、透彻的了解。要把美国吃透，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在研究了解美国的时候，要把美国的好做法、好学风学过来。美国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弹中练兵，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好作风。对于美国，我们要批判地学习。比如美国人的务实精神，美国人的创新精神，我们要好好学。对于美国，目前中国存在反美、防美、恐美、崇美、和美种种态度。为了中国的利益，为了和平，中国既要警惕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干预，又要与美国和平共处，除此之外，很难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我在清华和南京大学等几次演讲时，旧话重提。我说“夷”这个词涵

义中有把别国别民族当成另类的文化中心论思想，是错误的，不可取，应该换“夷”为“人”，在中文中“人”可指个人，亦可泛指民族、国家与人民。最近有朋友建议改成“师人之长以自强”，中国要自强，不是要制谁。这么一改，意义焕然一新。这个建议非常精辟，是一个纲领性的观点。

这几个月来，能够有这样许多新的感悟、新的认识，是我们合写这本书的最大收获。

这本书的写法，依然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相似，由我和李希光联系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完成。本书的目的是面对国际局势的最新发展趋势，提出新问题和新看法，所以既需要有认真的思考，又需要有充分有力的事实依据。书中有几章是我与李希光的对话，还有我与希光分别写的文章或讲演稿，其中思考的成分居多，其他的文章侧重对最新的媒体动态的分析。第三部分的几篇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透析美国媒体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几位作者对于本书提出的大问题，基本上有一致的意见，当然各人的经验与角度还是不同的，所以我的意见、希光的意见也不尽代表每一个作者的看法。本书的写作仍然是在非常紧迫的情形下完成的。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努力，力求认真、细致，但还是显得相当仓促。我们是真诚地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意见的。本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因此格式上缺少学术著作的严谨，这一点需要加以说明。我们希望写成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书，这是我们写《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时就有的意图。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就有待读者来检验了。

刘　康

1999年9月于美国宾州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媒体轰炸的背后

一、科索沃随想录

——刘康与李希光对谈之一 1

二、新冷战思维的崛起

——对巴尔干战争中美国媒体轰炸的思考 15

(一) 如何认识新世纪的趋势 16

(二) 新冷战思维的崛起 19

(三) 媒体轰炸与妖魔化 28

(四) 认识美国,把握自己 40

三、新闻热线上的交锋

——中美学者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场讨论 45

四、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59

(一) 从“五四”到“五八” 60

(二) 政府组织学生游行? 70

(三) 弘扬爱国主义,反对民族情绪 81

(四) 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大学生 86

五、“不是冷战,但寒气袭人”

——关于美国媒体 1999 年中国报道的评析 91

(一) 美国媒体怎样报道中国使馆被炸事件	92
(二) 美国媒体怎样报道“中国间谍案”	115
(三) 从言论版看美国主流媒体的立场	126
六、受控于一只看不见的手	139
(一) 美国媒体的双重标准	139
(二) 美国媒体的政治偏见	143
(三) 美国媒体的负面影响	149

第二部分：后冷战时代的新闻霸权

一、如何塑造 21 世纪中国的国际形象？	
——刘康与李希光对谈之二	152
二、信息时代的意识形态	175
(一) 美国大学课堂上的争论	175
(二) 美国大众传播中的意识形态	185
(三) 美国意识形态的三大支柱	192
三、揭开文化帝国主义的面纱	214
(一) 通俗文化霸权：让你自愿当奴隶	214
(二) 语言霸权：让你永远处于二流地位	218
(三) 新闻信息霸权：全天候的“轰炸”	221
(四) 图穷匕首见	224
四、西方传媒如何制造思想一致？	228
(一) 传媒洗脑十四招	229
(二) “思想共识”背后的权力精英集团	266
(三) 国家利益与妖魔化中国	279
(四) 树欲静而风不止	286

五、非民主的民主	293
六、西方传媒角逐国际舆论市场透视	301
(一) 北约是怎样操纵和利用新闻媒介的	302
(二) CNN 和 BBC 是怎样误导公众的	307
(三) 西方媒介在科索沃危机中为什么报道不公	312
(四) 科索沃危机中各方对媒体的“管理” 给我们的启示	314
(五) 学会运用国际传媒市场的游戏规则	317

第三部分：真实记录历史，但不要妖魔化

一、中国通记者：浪漫的一代	325
二、在中国取景	333
三、出使北京	
——尚慕杰大使与美国电视观众的谈话	339
四、中国庆祝国庆 50 周年	
——美国公共电视台专题报道脚本	344
五、美国新闻界的传奇兄弟	
——记美国新闻界的两位老记者	352
(一) 随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	353
(二) 兄弟俩的对话	356
(三) 智访乔冠华	358
(四) 马文怎样教哈佛学生写杂文	361
六、中国间谍案是一个骗局	365

第一部分：媒体轰炸的背后

一、科索沃随想录

——刘康与李希光对谈之一

刘 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

李希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

时 间：1999 年 4 月

地 点：美国中部阿巴拉契亚山中的宾州大学校园

李希光（以下简称李）：从人群熙熙攘攘的哈佛广场到阿巴拉契亚山中安静的宾州大学校园，到处充满了春天的阳光。望着那些早早换上短裤的美丽的女学生和身穿 T 恤衫的健壮的男同学在温暖的阳光下坐在一起认真读书和做作业的样子，我一方面为他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美好的环境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想到大西洋的另一边，生活在南斯拉夫这个弱小

国家的各民族的男女大学生,由于北约 19 国联军的狂轰滥炸,无法像他们的美国同龄青年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刘 康(以下简称刘):你只有切身感受,才能够对和平、战争、人权、自由等抽象的概念有感性的体验。美国人对这一切的感受当然是与南斯拉夫人截然不同的。我想你作为一个记者,对于这些感性的东西是有特殊的敏感的。我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和教室里度过的,每天思索和写作的是很抽象的东西,不过一切抽象的东西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生存环境和活生生的人。我越来越认识到把抽象的概念与活的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性。但反过来讲,有许多人做的事情恰恰是把这种联系割裂开来。在美国,做这样的事的人很多。坦白讲,美国的许多学者、政客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讲的都是美丽而抽象的概念,如人权、自由等。但是,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环境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美国的大学生感受到的人权和自由与今天科索沃青年的感受会一样吗?美国的媒体、学界、政界告诉世界的是:这些抽象的概念普遍有效,意义相同。你在哈佛是不是每天听到这样的话?

李:自从两个星期前北约开始向南斯拉夫发动战争以来,我在波士顿这块聚集了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库和学术机构的地方,的确学到了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或者说,我开始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具体地说,就是我现在开始相信了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一、好人难找,客观的学者更难找;二、美国的学者和记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在全世界的胜利,而不是为了寻找真理或真相去研究和写作;三、自由旗帜下也有思想控制,民主制度下也有洗脑术;四、在人权问题上,无论政界、学界或新闻界,美国只要一个标准:国家利益;五、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几年前提出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被南斯拉夫战争击得粉碎;六、国家至上主义已经